

南华文存

俞兆平 著

——俞兆平学术论文精选

闽籍学者文丛

第二辑 MINJI XUEZHE WENCONG

张炯 吴子林 主编

美学的浪漫主义与政治学的浪漫主义
现代性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美学
严复对科学的引进与中国文化现代转型
论林语堂浪漫美学思想
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唯理主义与经验主义
“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视野
《阿Q正传》新论——越界的庸众与阿Q的悲剧
梭美学视点中的沈从文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南华文存

——俞兆平学术论文精选

俞兆平
著

闽籍学者文丛 第二辑

福建文艺发展基金资助项目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华文存：俞兆平学术论文精选/俞兆平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 3

(闽籍学者文丛/张炯，吴子林主编. 第二辑)

ISBN 978-7-211-07529-4

I. ①南… II. ①俞… III. ①文学—文集 IV. ①I—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12999 号

南华文存

NANHUA WENCUN

——俞兆平学术论文精选

作 者：俞兆平

责任编辑：张 宁

出版发行：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0591-87533169(发行部)

网 址：<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fjpph7211@126.com

地 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350001

经 销：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福建省金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福州市晋安区福光路 23 号

邮政编码：350014

开 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22.5

字 数：296 千字

版 次：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11-07529-4

定 价：4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总 序

本丛书为闽籍知名学者的学术论著精选集。

福建地处我国东南海隅。南临大海，有一条美丽绵长的海岸线，让人联想起一种开放性；北为武夷山脉等群山所隔，又略显局促、逼仄。地理位置的这种矛盾性特点，一方面，使闽地学者不安于空间狭小的故园，历经磨难而游学四方，冲出“边缘”进入“中心”；另一方面，又有一种与“中心”相疏离的“外省”特色，在“中心”与“边缘”之间保持着必要的张力。这有力地塑造了闽地文化独特的“精神气候”：有比较开阔的世界性视野，善于借助异域文化经验、文化优势来实现自己、完成自己，建构属于自己的原创性理论话语，占据着学术思想的高地。

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原文化渐次南移，尤以唐宋为甚，故闽地学人辈出不已。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期，福州、厦门被列入“五口”开放，西学进入沿海城市，闽地涌现许多文化先驱，一度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之一。如，“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严复，译介域外小说的林纾，等等。此后，闽地文化人如鲍照诗所云“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以其才智和气魄在激烈竞争中居于重要地位。

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化又一转型期，闽地文化人再次异军突起、风云际会，主动发起、参与了当代中国文坛数次

意义重大的论战，发出时代的最强音，大大深化了80年代以降的文学变革和思想启蒙，成为学界思想潮流的“尖兵”。为此，当代著名作家王蒙提出了文学理论、批评界的“京派”“海派”“闽派”三足鼎立之说。这对于一个文化边缘省份而言，既是悠久历史传统的复苏，也是未来文化前景的预期；既是一项殊荣，也是一种鼓舞。

当代学术中“闽派”的提法，不仅仅是一个地域概念，更是一种文化概念。这个以地域命名的学术群落，散布全国各地学术重镇，每个人的文化素养、价值观念、审美向度和言述方式大相径庭，但都在全国产生了辐射性的影响力，充分展现了八闽大地包容万象的气势。职是之故，我们不拘于一“派”之囿，以“闽籍学者”定位这一丰富的文化现象。

受福建人民出版社的委托，我们欣然编选、推出这套“闽籍学者文丛”，其志在薪梓承传，泽被后学，为学术发展尽一绵薄之力。古人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闽籍学者阵容强大，我们拟分期分批分人结集出版，以检阅闽地学人的学术实绩。

这是“闽籍学者文丛”的第二辑。本辑推出的是我国当代文学界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文学史家、文学评论家，既有年逾九旬的老学者，也有中青年学术新锐；每人一集，收录有分量的代表性论文，凸显“一家之言”的戛戛独造。

如果时机成熟，本文丛还将进一步扩大规模，我们真诚地希望读者诸君一如既往地提出宝贵的建议。

张 炯 吴子林

2016年12月9日

强化史实为证 回归历史语境（代序）

——俞兆平先生谈为学之道

张艾弓（以下简称为“张”）：俞老师，前些天我听到您对学生说，您成了“70后”。

俞兆平（以下简称为“俞”）：对啊，今年摇身一变，变成了“70后”队伍中的一员。但并非假冒伪劣，我的心理年龄并不比真正的“70后”来得苍老多少，玩微信跟你们一样活溜，老顽童罢。

张：所以师门弟子们都说您是“逆生长”。

俞：过奖，过奖。返老还童，讲究的是一颗赤子之心，真诚，温热。还是言归正传吧。

张：那就从老师的学术生涯谈起。您是如何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的？

俞：我的导师郑朝宗先生说过一句话：“创作靠天分，学术靠勤奋。”我创作天分不够，学术研究又不够勤奋，未能成一番气候，看来也是天意。

20世纪70年代，我是写诗的，跟着孙绍振写“八万里雷霆，九万里风暴”的政治抒情诗，政治是不少，诗情却寡淡。不过，在当年福建诗坛上也还是混了个小有名气的吧。记得80年代后期的一个晚上，舒婷到厦门大学鲁迅纪念馆与鼓浪文学社同学座谈，突然言

及我在1974年写的配画诗《申请入党》。一个谈不上套路的花架子，居然会在武林高手的大脑皮层中留下痕迹达10余年，可见当时她还是在意的，也说明我那花拳绣腿还是对得起福建父老乡亲的。但到了70年代末，“新的美学原则崛起”，舒婷等一批高手上马，我们这些“伪诗人”便自然知趣而退了。醒悟最早的还是孙老师，他对我说：“我们这批人的诗性思维已被毒化，没救了。”拿舒婷们的诗一比对，我也深深地感触到自己在诗情运思、语词组构中程式化的僵滞。于是，就跟着孙老师改弦更张，去爬理论那座山了。

张：从话语中可以听出，您对孙绍振老师有种特殊的感情。

俞：的确如此。我有时甚至感到孙老师是上天给福建送来的“怪物”，就像那只把鱼缸搅得难以安宁的鲶鱼，那头把牧场闹得羊蹄马蹶的野狼，当然这是指年轻时候的他。如果没有他，福建文学理论界肯定摆脱不了老气横秋的沉闷。我很幸运，在寻路的途中能遇上他。我一直尊他为学制外的导师，我们亦师亦友的情分已40余年了。70年代初，他带工农兵学员到霞浦县开门办学，淤积了一肚子的小道新闻、沉思多时的理论追索，没处发泄，大概看到我的相貌属于那种不会当叛徒的类型，就放胆地在我那间“进门脚都没地方放的小屋”里大放厥词，连江青也没放过，害得我不时伸头探脑，望望门外，心惊胆战了好一阵子。也就是他的狷介狂放，让我领略了真正的文人气质；而他口中不时蹦出的理论名词，成了引诱我走向理论研究道路闪跳着的火花。

张：所以您后来就报考了文艺理论专业研究生。

俞：这就谈到我生命中遇到的第二位贵人——许怀中老师。或许是巧遇，或许也是天意，1976年8月，也就是毛泽东主席去世前一个月，我从霞浦一中借调到省里写剧本，准备参加全国曲艺会演，住在西湖宾馆。正好许老师也因撰写文稿住宿于此。他和孙老师恰好相反，细语慢言，老成持重，慈眉善目，一副菩萨形神，属于那种大智若愚的文人类型。晚饭后在西湖边散步，大概我搬弄了一些从孙老师那里拾来的“牙慧”，引起了许老师的注意。他通常不动声

色的目光竟流露出赞许的意味：孺子像是可教也。由此，铸就了我和他的因缘，1979年成了他和郑朝宗先生联合带的研究生，开门弟子也。

张：听说这是厦门大学中文系自1921年创立以来第一届研究生。

俞：是。当年厦大中文系有郑朝宗先生坐镇，上承鲁迅、陈衍，下启刘再复、南帆，加上在国内外开先河的“钱学研究”（钱锺书研究），颇有南天一帜的气势。郑先生毕业于清华，后留学英伦，负笈剑桥，兼之家学渊源（先生之父曾任林纾文书，为其抄写、校正、誊清译稿），国学根底深厚，若论学贯中西者，在厦大非他莫属。那时，郑先生年近七十，身体依然硬朗，日常如“老树临风”，一派长者风范，但在课堂上若渐入境界，则神采飞扬，激情四射，诗人气质闪现。隔年夏季，衣着渐少，我突然发现先生后背上有一大肉瘤，私下问及许老师，方知是打成右派及“文革”下放劳动时挑担所致，一股悲凉之气顿时袭来，在劫后余生的老一辈跟前，你能不珍惜难得的今日时光吗？

张：特定的历史语境，锻造了你们这一代人的精神气质和学术个性。

俞：从学术角度着眼，郑先生确是给厦大中文系留下了一笔重要的遗产，这就是文学研究中的实证原则，若要以学派论，或许这就是厦大学派的传统。1960年，厦大列入重点大学，学制改为5年，系里制定新的教学方案，郑先生献策，内有一条：“要培养同学收集和处理第一手资料的能力和习惯。这也是给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打好了基础。只知运用第二手资料，不仅会以讹传讹，而且研究的成果质量必然不会太高。”学术研究中，归纳胜于演绎，这也是闽人严复所强调的，他称之为“内籀”。郑先生一生崇拜“严林”（严复与林纾），由此亦可呈示。而且郑先生重视的是“第一手资料”，即原始资料，强化史实为证，这就逼着他的弟子们爬梳史料，披沙拣金，走的是笨拙却扎实的路径。记得一次我上交学期论文，只因文中引

英国批评家阿诺德的一段话，底下注释用“转引自”，被先生狠狠地批了一番：“怎么能转引？为什么不去查原著？”后来记起我是念俄文的，不是念英文的，才放我一马。

立足于原著或原始资料，方可进入研究，此治学之道让我受益终身；同时，也深深体味到先生“以讹传讹”一语内蕴的分量。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先生就已看出中国学术研究中存在的弊端——当某种意识形态以君临之势掌控了一切可能的思维走向时，势必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历史与存在的真实。多年后，我在《中国现代三大文学思潮新论》一书“后记”中写道：“我常震惧于由预先的理论命题设定所形成的‘传统’那牢不可破的威力，在确凿史实的质疑跟前，‘预设’仍安然如山，不改分毫。从预设的命题出发，进行演绎式的推导，这种黑格尔主义的先验论，这种被顾准称之为‘逻辑神学’的思维形式，何时才能得到纠正？”这一带有怀疑论色彩的感悟，其源点正来自于先生当年的教诲。

例如，国内现代文学界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极为稳定的思维定式：写实主义的文学研究会和浪漫主义的创造社，二者是文学史上最为突出、相对峙的文学社团，国内最权威的几部现代文学史著作也是如此定论。我曾就创造社与浪漫主义关系查阅过有关的资料，并做了统计：1922年8月，郭沫若的《创造》季刊《编辑余谈》；1923年，郁达夫的《文学上的阶级斗争》；1923年，成仿吾的《写实主义与庸俗主义》；1926年，郭沫若的《革命与文学》；1927年，郁达夫的《文学概说》；1928年，冯乃超的《冷静的头脑》……这些文章均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持摒弃、批判，以至否定的态度。也就是说，在1930年之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中，查不到创造社主要成员肯定、推崇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任何史实。但迄今为止的各部现代文学史均把创造社列为最具典范性的浪漫主义文学社团。这一思维定式、观点预设，强大到连“史实”都无法纠正其偏误。究竟我们是相信史实呢，还是相信预设的判断？这些“预设者”在解读时有没有可能产生错位、误读，乃至故意误导呢？这不能不是个严

峻的问题。如果连“史实”都可以漠视的话，那么我们的研究有何价值与意义呢？

张：所以你在给我们讲课过程中，一再强调原态史实的实证与历史语境的纳入，这是进入学术研究的两大原则。

俞：这正是你们这一代学人所欠缺的。这些年来，我参加、主持过多场硕士、博士毕业论文的答辩，深感严复、郑朝宗、许怀中等老一辈学者所执守原则的重要性。现今学界，浮躁之风日盛，“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太多的诱惑侵蚀着为学所必备的淡然、笃定的心境，因而在学术研究上多寻捷径，演绎式的逻辑思维盛行其道。此类论文一般多是从新近流行的西方文论中拾得一二概念，然后以其为预设的命题，由此出发，才去搜集相关资料（其中多有郑先生所贬斥的“第二手资料”），继而罗列演绎成章，以此来印证预先提出的假设。此法虽可一时快速奏效，但经不住学术自身发展的检验，往往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湮灭。

张：老师一下击中当前不良学风的要害。关于学术研究中演绎与归纳两种方法的选择与操作，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俞：由于强调史实实证，在老一辈学者心目中，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每推进那么一小步，都极为艰难，这才有“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之典，才有“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做半句空”之说。所以我对一年能出几本专著的聪明人始终将信将疑。学海茫茫，笨人碌碌，每当我从书堆中淘出新的史实，就像发现新的星体般，喜悦之情非言语所能道出。但史料的寻找，用的是披沙拣金的笨功夫，劳而无获是常有的事，许多人便因此而放弃。现在，学风严谨、以身作则的老一辈学者多已作古，我们这些弟子们也渐渐退出舞台，但承接薪火，传递下代，仍是我们职责所在。

当然，以史实为证、以归纳为主的研究方法也不能绝对化。资料、史实的开掘与新的理论视角的建立并非矛盾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在学术研究中，宏观性、战略性的视角的建立仍然十分必要，它多来自新的历史语境与新的社会思潮，有着形而上的意味，它和

那种战术性的预设的具体命题完全是两码事。当这种战略性的、全局性的新的理论视角建立起来，就如同一盏聚光灯亮起，一条期盼已久、新的研究路径展现在跟前，那些尘封多时被人遗忘的史料，或被人们熟视无睹的，乃至边缘性的史料，都将被照得熠熠生辉，焕发出新意。像 20 世纪末“现代性”理论视角的建立，对我的研究的启示与引导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但它在我的论著中绝非作为名词概念的外观点缀，而是成为精神内质深深地渗透在章节文句内里，成为有机的组成成分。

张：老师上面向我们讲述的为学之道，很有启示，作为厦大的弟子，更应铭记在心。由此，我也慢慢品味到老师著作中“史实为证”的分量，也明白了老师在国内学界几次论战中能立于不败之地的原因。

俞：回望来程，我在学术之路上已蹒跚了 35 个年头。我曾自嘲，在文学评论界，我属于“三栖类”人物，教的课程是《文学概论》，干的事情是负责学报编务，学术研究着力点却是现代文学。同时，还出过诗歌理论专著（《诗美解悟》），写过马克思主义美学论文（曾转载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美学》该期头条），一度研究过港台文学（曾刊发于《文学评论》该期头条），甚至纵马到艺术领域（《论艺术的抽象》一文在“中国美术家网”的“文艺理论”栏目作为重点文章推出多年，长期保留至今）……可谓随心所欲、自由散漫到了极点。但这种“打一枪换一道壕沟”的“流寇式”的作风，带来的结果是没有牢靠的“根据地”，这一弊端到后期方才有所觉悟。当年，徐志摩曾反省道：“凡性气高傲人，往往旁骛不肯专一，此所谓聪明误也。志固不可不大，而亦不可过大，必笃必颀，乃实乃张，读书所以致用，若摇惑眩乱，如入深雾，不知西东矣。”此处绝非欲攀比徐公，而是他点到吾之痛处，故多年不忘其训。

在现代文学，准确地说，应是现代文学理论方面，我的研究成果可用“一二三四”来概括之。一是《闻一多美学思想论稿》，二是《中国现代作家论科学与人文》（科学与人文对峙），三是《中国现代

三大文学思潮新论》，四是《浪漫主义在中国的四种范式》，似乎有点学术操练的味道吧。这四本专著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广西师大出版社（两本）出版、发行，其规格、档次还算可以吧。

张：《闻一多美学思想论稿》出版较早，像是在20世纪80年代吧。那时出书听说不太容易，比现今严谨许多，出版社精挑细选，对学术品位的要求重于经济效益。

俞：是1988年，但构思的时间更早，是在念研究生时期。1981年刘再复出版了《鲁迅美学思想论稿》，轰动一时。刘再复对母校情意深切，寄了一大摞新书到系里，连我这在读的研究生也分得一本。我如获至宝，置之案头，捧读再三，受启良多，故仿效之来写闻一多，研究生毕业论文即是《闻一多美学思想论稿》一书的第一、第二章。该书在上海出版后，我即呈送刘再复，当时他曾高兴地对人说：“厦大我的一个师弟也跟着我写出一本《闻一多美学思想论稿》。”此书是我出道后第一本专著，虽留有意识形态转型初期青涩、粗糙的痕迹，但在当时仍受到海内外同行的重视与好评，《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都发表评论文章，评介它的首创性与拓展性。它之所以能获得学界肯定，郑朝宗、许怀中两位先生莫立并身体力行的“厦大学派”文风，即立足于对“第一手资料”的发掘、梳理、论定的原则，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张：但《中国现代作家论科学与人文》却是在2013年出版，与《闻一多美学思想论稿》时隔近30年，时间跨度挺大。

俞：此书是慢工细活，从构想到成书，拖了多年。它的特点亦是立足于原始资料之上，先发掘、累积、梳理，再作出论析、判断。其写作动机，受启于20世纪末国内兴起的关于“现代性”及现代性构成要素——“科学主义”的研究热潮。当时，哲学界对1923年“科玄论战”与中国文化思想发展关系的再度审视，史学界对晚清以来的科学思潮对国学与史学影响的探索，相当红火、热腾。受此影响，我在阅读文献、爬梳资料时也不时闪现出这一视点，发现在这

一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不少现代文学作家对科学与人文问题也作出相应的论析与独到的判断。这样带有随意性的资料累积约有一年多时间，有一天，我忽然悟觉，若从“科学主义”这一视角切入，对中国现代文学及现代作家，特别是对现代文学思潮重新加以考察与论析的话，能否开拓出一条新的研究路径呢？

这就涉及我在学术研究中所强调的第二条原则——历史语境纳入的问题。我们知道，科学与民主是飘扬在五四上空的两面大旗，但多年来，国内外学界对“民主”思潮和中国五四新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得比较深入，如人的觉醒、个性的解放、人性的自由，以及重铸国民灵魂等；而对于自19世纪末产生的“科学与人文对峙”这一宏大的世界性的历史语境却忽略、遗漏了。特别对“科学主义”思潮和五四新文学及现代作家之间的关系研究甚少，像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何以抨击“唯物质主义”这一“偏至”，至今未能真正破解。这就为后人留下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也就是说，若能回归客观的历史语境，从科学主义的视角进入，不但可以打破现代文学界对这一课题研究的冷清的局面，还可促使学界对五四新文学及文学思潮的研究，能突破原有的框限，向文化、历史、哲学、美学的层面深入与拓展，从而更为客观、真实地接近与再现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原貌。

因此，我就带了一位博士生，从科学主义这一全新的视角切入，在国内学界第一次全面梳理了中国现代作家对科学与人文关系的学理论述与价值判断，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所论及的现代作家计有：王国维、梁启超；鲁迅、徐志摩、林语堂、梁宗岱；胡适、郭沫若、茅盾；以吴宓为首的学衡派，以及梁实秋、闻一多、丰子恺等。其间爬梳的“第一手资料”之多，耗费的心力之大，自不必多言了。

张：但老师在学界影响更大的应该还是在《中国现代三大文学思潮新论》和《浪漫主义在中国的四种范式》这两部专著。

俞：没错。这两部著作确实是我竭尽心力之所得。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我比较重视文学思潮。在国内学术会议上曾多次提出一个观点：重写文学史，首先必须重写文学思潮史。因为由作家群体的“社会心理”和美学倾向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融合而成的文学思潮，是文学史的基本构成单位。只有正确地描述文学思潮，才能正确地叙述和建构文学的历史。

但国内现已流行的诸种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文学思潮的论述方面都还不够完善，有所欠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第一，在浪漫主义方面，把卢梭的美学的浪漫主义和高尔基的政治学的浪漫主义混为一谈；第二，在现实主义方面，忽略了形成文学写实主义内在的“科学主义”这一学理动因；第三，在古典主义方面，一笔勾销了古典主义思潮在中国现代文坛的存在。《中国现代三大文学思潮新论》一书就是在发现以上三个方面的疏漏之后，才逐步展开探索的，并提出具有一定原创性质的观点。

其一，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体系中的浪漫主义思潮主要有两大类：以卢梭为代表的“美学的浪漫主义”和以高尔基为代表的“政治学的浪漫主义”。前者的内涵侧重于对历史现代性的批判，即对人类文明及科技理性发展所带来的负值效应的忧虑、质疑与抗衡；后者则把浪漫主义当成隶属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中的一种成分，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20世纪30年代后的中国，政治学的浪漫主义排斥、取代了美学的浪漫主义，在具体文艺实践中带来一系列令人困惑的现象。实质上，郭沫若与沈从文就分别代表了这两种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文学界的不同的命运。

其二，现实主义理论包含着科学认知与人文理解这一对矛盾。“写实”意味着遵循自然科学的认知原则，对客体对象精确、逼真地反映与复制；而“文学”却是一个虚构、想象性的人文世界，渗透着作家主体的精神意愿与价值取向，即作家对人生、世界的“理解”，而且还负载着对读者道德的教喻与训诫的功能。这一悖论式的两极趋向，在中国文学对西方写实主义的接受进程中始终交错、纠缠在一起。中国文学界对西方“写实主义”的接受，有着从早期的

向科学认知原则倾斜的写实主义（真即是美）；到中期的科学认知与人文理解交错的写实主义（不脱离现实的真善合体）；再到后期的向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人文理解倾斜的写实主义（善即是真，善中之真方为美）的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写实主义的概念始终处在动态的、不断的调整之中。

其三，学界诸种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论著，论及 20 世纪 20—30 年代文坛时，有浪漫主义思潮与写实主义思潮的“双峰对峙”，有以象征主义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思潮，唯独见不到古典主义思潮的踪影。如卸却政治判断的预设，纳入现代性历史语境，从历史真实出发，学衡派与新月派于内在学理上是一脉相承的，他们在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的理论基础上构成了中国现代古典主义文学思潮。这一思潮有着发端、演进、高潮的历史进程，有着自身理论体系和创作业绩，它对于因历史现代性的偏执而导致人文精神失落及学术衰微的中国学界的现状提出了质疑与抗衡，构成推进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合力。

这三大观点，说是对现有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增补亦可，说是质疑也未尝不可。有另一种声音的发出总不是坏事，单调才意味着学术研究中生命活力的寂灭。值得一提的是，陈思和教授曾在《学术月刊》上对上述“现实主义与科学主义关系”问题作出评价：“俞兆平教授的论文，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中国 20 世纪 20 年代的写实主义文学思潮中有一个‘科学主义的内在启动力’，并且在‘科学认知与人文理解的对峙与交错中’论析写实主义文学思潮如何在接受中的变化与演进。作者引用了丰富的资料来论述科学主义与人文理解之间的消长过程和真善美因素的排列变化，这就超越了从思潮看思潮的就事论事，提升到文艺本体的意义上来讨论这一文学现象。”肯定了这一新的视角对开拓文学现实主义研究的作用。

张：老师思维有钻探式特性，但在一定深度的层面上往往又能推导出另一广度，拓出新地。对此，我们同学都深有所感，像《浪漫主义在中国的四范式》就是在前述“三大思潮”研究深化之后

而展开的。

俞：一项有价值的选题发现之后，就不要轻易放弃，若继续推进、深化，往往能拓展出一块新的天地。对浪漫主义相关资料作认真、全面的考察之后，我发现在西方文化史上，浪漫主义是一个意义庞杂、内涵宽泛的跨学科的概念，它涉及了伦理学、政治学、哲学、美学等，学科界域远远超出了文学艺术的范围。其定位也是最为繁复多样的。从空间上看，由于当时各国历史状况并不相同，法国侧重政治革命，德国侧重思想革命，英国侧重产业革命，因此，各国的浪漫主义思潮也就各呈异态。法国就有以卢梭为代表的抗衡人类文明异化的美学浪漫主义，以雨果为代表的反抗古典主义清规戒律的文学的浪漫主义；德国有康德、谢林、施莱格尔、诺瓦利斯，以及而后尼采等为代表的“浪漫哲学”或曰“诗化哲学”的浪漫主义；英国有华兹华斯、柯勒律治为代表的感伤的浪漫主义，有拜伦、雪莱为代表的激情的浪漫主义等。从时间上看，浪漫主义思潮纵贯三个世纪，它的许多美学要素渗入到当代哲学、美学、文学艺术的思潮中去，构成血脉相连的关系，如存在主义哲学思潮、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五四时期称之为“新浪漫主义”）在对人类文明的建构与解构，在对科技与人文分裂的批判等问题上，都显示出它和早期浪漫主义的亲缘属性。

在表现形态上，它更是千姿百态。撰写《世界文明史》的威尔·杜兰特曾做过全面精要的概括：“浪漫运动是何意？乃感觉对理性之反叛；本能对理智之反叛；情感对判断之反叛；主体对客体之反叛；主观主义对客观性之反叛；个人对社会之反叛；想象对真实之反叛；传奇对历史之反叛；宗教对科学之反叛；神秘主义对仪式之反叛；诗与诗的散文对散文与散文的诗之反叛；新歌德对新古典艺术之反叛；女性对男性之反叛；浪漫的爱情对实利的婚姻之反叛；‘自然’与‘自然物’对文明与技巧之反叛；情绪表达对习俗限制之反叛；个人自由对社会秩序之反叛；青年对权威之反叛；民主政治对贵族政治之反叛；个人对抗国家——简言之，19世纪对18世纪之

反叛”。几乎涉及了人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政治生活的所有方面，展现出多重多样的表现形态。

内涵如此复杂多义、形态如此变动不居的浪漫主义，当它作为一种异质文化进入中国，势必会和本土文化产生冲撞，并为本土文化所同化而产生变异，呈现出多样的状貌，凝定为多种范式。但中国学界关于浪漫主义的研究，却局限于现象性的、静态的、单一学科的描述，多把它缩减到仅隶属于文艺的一种创作方法，并把思潮的整体性切割成若干特征的横断面。例如，今日高校文艺理论教科书一般是这样界定的：“它以强烈的主观态度、热情奔放的情感力量、无拘无束的幻想精神、奇特神秘的艺术色彩，将理想型文学发展到极致。”理想、情感、幻想成了浪漫主义的三大要质。这种概念界定仅是高尔基式政治学浪漫主义在中国文学理论中的延续，20世纪30年代以来，以郭沫若为代表的高尔基式的政治学浪漫主义在中国的美学、文艺学体系中占有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而像以早期鲁迅为代表的尼采式的哲学浪漫主义、以沈从文为代表的卢梭式的美学浪漫主义、以林语堂为代表的克罗齐式的心理学浪漫主义等，几乎全被否定、被遗忘了。从而导致中国的具体文艺实践，产生了一系列混乱的、令人困惑的现象。对于如此严重的美学偏误，国内学界多年来却无所觉察，这不能不令人警醒。

因此，在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学理论的研究中，我提出一个全新的命题：20世纪上半叶，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分化为四种主要范式。一是以早期鲁迅为代表的尼采式的哲学浪漫主义，它偏于从强力意志的角度激发悲剧性的抗争精神；二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卢梭式的美学浪漫主义，它偏于从美的哲学角度对人类在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异化状态的抗衡；三是以1930年之后郭沫若为代表的高尔基式的政治学浪漫主义，它偏于从政治角度对无产阶级功利价值的追求；四是以林语堂为代表的克罗齐式的心理学浪漫主义，它偏于从心理角度对表现性的创作本质的推崇。这样的学术判断，是否能比较贴近纷繁复杂的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